

The Development of Contraceptive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Yixuan Xu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China

Abstract

Fertility is the only way for human reproduction and an important key to racial continu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reproduction is no longer a common biological phenomenon, but has gradually been endowed with different value connotations and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the meaning of reproduction has also undergone changes. China has always had the traditional ideology of “accumulating grain to prevent hunger, raising children to prevent old age” and “unfilial piety has three consequences, and having no offspring is important”. People have a deep family concept, and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as even a pursuit of the concept of “five generations living together” in a big family; In times of war and revolution, population shortage was a fatal problem, and modern China had long been in an unstable state, urgently needing to replenish its troops; Moreover, as a major agricultural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China has the national condition of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high demand for labor”. Therefore, women’s fertility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whether long-term stable peace can be achieved,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fertility; contraceptive technology; female; technology

浅谈中国文学史视域下女性避孕技术发展研究

徐熠轩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生育是人类繁衍的唯一途径和种族延续的关键。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生育不再作为普通的生物现象出现,而是逐步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意蕴与内涵;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中,“生育的意义”也发生着改变。中国一直有“积谷防饥,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人们家庭观念深重,古时甚至多有追求“五世同堂”大家庭的观念;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人口短缺更是致命问题,近代的中国长期处在不和平状态,急需补充兵员;并且中国长期作为农业大国,拥有“农业为本,对劳动力需求大”这一国情。因此,妇女的生育变得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着能否取得长久稳定的和平,更与民族人口的延续和国家的发展繁荣息息相关。

关键词

生育; 避孕技术; 女性; 科技技术

1 引言

在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都尚未发展起来的时代,妇女的个人价值是和生育紧密联系起来的。“出嫁、怀孕、生育、养育”四个简单的词仿佛就能概括女性的一生——尽管在特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中,生育被赋予了崇高的政治价值和神圣感,不科学、无节制的生育和违背女性意愿的生育依然可以被视为父权制对女性的迫害和压榨。随着思想解放,女性逐渐意识到掌握生育自主权的重要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

写道:“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喊出“妇女解放”“母性自觉”“生育自由”的口号。为了掌握生育自主权,除了在思想上做好觉悟,科学的避孕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论文结合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生育书写,介绍避孕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于女性的重要意义。

2 从中国文学史中的女性生育看避孕技术的必要性

在中国文学史上,“妇女生育”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书写主题。在晚清时期,妇女的生育被作为提升国力的手段与“救亡图存”的思想结合起来,女性被赋予“国民之母”的称号。文学作品鲜少关注女性个体生命,而主要以政治为导

【作者简介】徐熠轩(2003-),女,中国浙江衢州人,本科,从事电影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等研究。

向描写其“为国家生育新一代优秀国民”的生育价值。五四运动成为了生育描写的转折点，作家们受到西方自由平等思潮的影响，将目光转向了生育背后的女性心理体验和文化意义。五四运动后的文学展现出对生育的新认知，不仅出现了批判落后生育观念和父权制度对妇女生育价值的压榨的作品；另有一批女性作家将自己对生育的真实感知表达出来，其中不乏凸显强烈女性意识的优秀作品。进入当代，女性生育的政治价值再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高的意义”背后是女性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被迫雪藏。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纷纷拿起笔传达自己的生育观念，甚至以大胆的“身体写作”反抗隐藏在从性行为开始一直到怀孕生育过程中巨大的不平等。

由于封建的生育观念和落后的避孕措施、流产技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妇女的性行为和生育是紧密相连的。同房几乎必然导致怀孕，而怀孕了就必然带来生育；生育结束后，相同的流程很快便再次循环……如此造成的结果是，一些妇女几乎大半辈子都处于无节制的痛苦生育流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不少作品展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

1922年，瑟庐在《产儿制限与中国》中问道：

“试问，像这样的毕生鞠躬尽瘁，专做那生育儿女的机器，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服务社会的余欲，经济独立的可能吗？”^[1]

与之相同的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倡导“妇女解放”“截止生育”“母性自觉”，由女性自己决定是否怀孕、生育；另有不少新兴阶层的进步女性试图反抗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让自己被传统家庭观念束缚，努力追求生育自由的权利。

显然，仅仅有思想观念的进步是不够的。极少数女性坚决与人类的本能欲望划清界限，从源头上解决怀孕的可能。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毓芳和云霖就试图通过“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来达到克制欲望、避免怀孕。另有一部分女性开始寻求避孕的方法，以达到性行为与生育分离的结果。由于西方科学的避孕技术尚未被民众广泛接受，民间传统的避孕方式依旧占据主流。这些老旧的“偏方”往往伴随着封建迷信的影子，有些甚至可能危及女性的生命。

3 科学避孕技术的发展

古代的避孕手段原始而愚昧，功效甚微而危害巨大。例如，古埃及女性在体内放置蜜、苏打和鳄鱼粪混合而成的稠状物；中世纪的欧洲女性在同房时，将黄鼠狼的睾丸系在大腿上或挂在脖子上；中国古代的女性则“以毒攻毒”，服用铅和水银避免怀孕。东西方都有用鱼鳔、羊肠、羊尿泡避孕的先例，这一方法和避孕套的原理类似。然而，人们难以从自然界中获取最合适自己的鱼鳔等。

16世纪初，由于欧洲大陆饱受梅毒摧残，意大利解剖

学家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便发明了亚麻布避孕套以阻隔病毒的传播。这一技术被整整使用了300年。18世纪末，享誉欧洲的大情圣、意大利作家贾科莫·卡萨诺瓦发明了子宫帽避孕法和柠檬避孕法，以此与他的上百个情人周旋，“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1841年，美国工程师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了橡胶硫化技术，直接推动了橡胶避孕套的生产 and 推广。人类自主掌握生育选择权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然而，远在大洋另一岸的中国，并没有受惠于这门技术。那一时期，只有清朝的张德彝在他的游历日记《航海述奇》记载了避孕套这一新事物：

“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2]

他将避孕套称为“肾衣”，成为中国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人。

1919年，出现了避孕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天然胶乳避孕套和它的自动生产技术被发明出来，迅速占领了市场，完全取代了橡胶制品。

20世纪50年代，避孕史上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出现了——异快诺酮-炔雌醇甲醚片（俗称避孕药）被发明出来，不仅为人类的避孕提供了更多选择，同时，进一步将生育决定权转移到女性手中。避孕药的发明，与女权运动的兴起和节育运动的浪潮是不可分割的。这次革命的推动者是玛格丽特·桑格和凯瑟琳·麦考密克——两位女权运动的先驱者，而受益者则是全体女性。

除了避孕套和避孕药这两种主流避孕技术，宫内节育器、阴道环、隔膜避孕、结扎手术等也是可行的避孕手段。它们各有利弊，却都为人类掌握生育自主权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

4 结合中国文学作品看现代避孕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遗憾的现实是，正当西方轰轰烈烈地开展避孕技术革命、女性节育运动并提倡“女性控制生育权”之时，中国根本没有普及西方国家先进的避孕方法。

1922年，玛格丽特·桑格受邀在中国进行节育演讲。她的演讲大大轰动了先进城市的年轻人，为“性”的禁忌打破、妇女的思想解放和避孕技术的推广奠定了基础。那么，当时的中国，究竟有没有现代避孕技术的传入呢？

答案是有的。但那时传入中国的避孕技术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了其普及范围小、推广程度低的结果。以下引用钟佳敏《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中的统计表格来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市场常见避孕用品进行分析（表1）^[3]。

表1 避孕药物价格统计

销售商	避孕药物	价格(单位:元)
饮和室	外搏停孕金丹	10/打 5/盒 1元试用
瑞华制药	节育停孕丹	5/粒
上海职工合作商店	加布西药片	1.9/盒
福华西药行	制育良友	1/盒 10/打
普球西药公司	产儿限制万应避孕球	1/盒 10/打
百昌洋行	她的友(Layd's Friend)	1.2/盒
天津时代公司	康妥乐(CNOTROL)	1.2/盒
福华西药行	男女节育器女用款	1.75/盒
	男女节育器男用款	0.9/盒
上海恒余洋行	如意袋(Condom)	10/盒

从表1可见,当时市面上虽然已有种类较多的避孕用品,但它们往往分量小而价格昂贵,性价比不高,并非一般城市职工所能承担。因此,现代避孕技术几乎只在大城市的新潮人群中流行;即使是大城市,也只有部分颇有资产的家庭能够负担。

当然,即使在大环境中的普及度不高,现代避孕技术的传入依旧大大推动了中国女性的性解放、避孕意识的增强和对生育自主权的掌控。当时的小说中,也对摩登太太们使用避孕用具达到性解放和享受人生的行为多有描述。如茅盾的小说《动摇》中,被称为“女性本位”描写的孙舞阳就服用了避孕药,以利于自己的纵情享乐。她所服用的,就是当时传入中国、并在新派人物中广为流行的避孕药:

“方罗兰拿起纸盒再看,纸盒面有一行字——Neolides-H·B,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揭开盒盖,里面是三支玻璃管,都装着白色的小小的粉片。”^[4]

孙舞阳这样的人物并非少数,根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在大都市的新潮太太们中间,“节育之风”一度盛行。不少女性利用避孕药物的帮助,大大减少了生育的痛苦,得以恣意正当地享受人生。

中国避孕技术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计划性”。

是计划的而非自由的,是官方的而非个人的。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光荣妈妈”政策还是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都体现出极强的计划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口短缺几乎让提倡了很久的“反对无节制生育”卷土重来;60年代的中国并非没有避孕药的自主研发,但研究刚取得进展,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下被吞没了痕迹;计划生育时期的节育,是在半强迫下的大规模节育器植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这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而非“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的节制生育”。

这也意味着,妇女并非凭借自己的个人意志得到了生

育自由的权利,她们的生育权依旧被掌控在父权制的手中,随时代环境改变而无奈转向。幸运的是,这一现象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缓解。今天的中国,尽管避孕药的普及率仍然较低,但对避孕套等其他避孕技术的运用较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避孕技术发展对女性的意义

需要直面的是,避孕技术的发展也会带来弊端。它的最直观负面影响在于新生人口的大量减少。并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跳出“家庭主妇”的身份,取得经济独立地位,女性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了。同时,对于意外怀孕的避免使得嫖娼、出轨等行为的犯罪成本降低,犯罪频率由此大幅增高,进而进一步导致了离婚率的上升。

当然,从对全体女性的影响来看,避孕技术的发展显然利大于弊。它使女性真正掌握了生育自主权,也掌控了生育的时期和数量。先进有效的避孕技术使得女性有能力将性行为与生育分离,不再被无休止的生育所绑架。由此,人类避免了无休止的人口膨胀和人地冲突。对女性个体而言,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和身体状况,和家人一同商量何时生育孩子、生育几个孩子;更有甚者,在巨大的压力和高昂的生育成本下选择不生育,尽管这在某些社会环境中会受到批判和嘲讽,但毕竟有了避孕技术,就能将身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重要的是,这一技术革新大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家庭结构和就业结构,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多的女性不再被迫地承受来自享受男女之欢的意外,并由此被束缚在家庭中操劳一生。她们更多地走出家庭,走入社会,为自己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女性就业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得到颠覆。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女性,就有了从根本上和掌控社会经济大动脉的男性相抗衡的底气。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全体女性的解放,为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奠定了基石——尽管从女性生育自主权漫长而又挣扎的争取进程来看,这一愿景似乎遥遥无期。

参考文献

- [1] 避孕简史[J].新民周刊,2023(27):79.
- [2] 钟佳敏.现代文学中的生育书写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1.
- [3] 王琴.论茅盾小说中的女性身体书写[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20.
- [4] 梁盼盼.“革命”与“身体”的“20世纪中国女性史”——重读《玫瑰门》[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3):169-181.